

清雍正朝对政治历史观的整饬

乔治忠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中国政治历史观中,包括“华夷之分”、“大一统”论、“正统论”等多种理念,成为困扰清初统治者的思想舆论问题。雍正朝开始对政治历史观予以整饬,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文字狱方式,并多次发布长篇谕旨,亲自对“华夷”、“朋党”、“大一统”等问题予以裁断,震慑一时,其中体现的是君主专制主义的发展,缺乏学理性和系统性,但一些论述如“帝王大一统”论,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雍正朝整饬历史政治观的收效,主要在于高压态势迫使多数学人就范,文字狱以及反对朋党、阐述帝王大一统的理念等等,给后来乾隆帝全面整顿历史观念和史学思想提供了示范。

关键词: 政治历史观; 整饬; 雍正帝; 文字狱; 帝王大一统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210(2015)04-0039-07

自先秦“殷鉴”观念的产生肇始,中国社会的政治与历史就越来越紧密地联接在一起,以史为鉴、以史资治、以史教化、以史明道等等一系列理念,似乎成为无可争议的共识,其中无不显示着史学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官方、政客还是学者,大都从政治得失和政权兴衰的角度研讨历史,提出政治见解又往往以历史事例为根据,以至于述说历史、评议史事也常常隐喻着政治主张,这构成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历史观。清初以来,政治历史观在官方与民间、清廷与一般汉族官员之间有着很不一致的见解,其中源远流长的“华夷之分”、“历史正统论”等理念,成为困扰清廷统治者的重要思想舆论问题。雍正帝即位之后,随即掀起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整饬:在政治上打击异己,加强皇权专制;在经济上推行“养廉银”制度、“摊丁入亩”、“清理积欠”、追补亏空、打击贪官等种种举措;在思想文化上同样采取攻势,打击异端观念,而整饬政治历史观就是其中一项重要举动。其内容包括以大兴文字狱和发布权威论断等手段,阐明清廷所推行的政治理论和历史观点,欲图促使臣民对朝廷主张得以广泛了解,并且以高压态势使之遵循。

一、兴起文字狱与“御制”论断

清朝顺治、康熙年间的文字狱,多为官府得到举报之后进行追查,一般不是皇帝、朝廷或官府着

意搜求所导致,庄氏史狱、《南山集》案都是这样发生的,清初函可之案也是江宁驻防军循例盘查发现的疑点,不是故意搜出“违碍”书籍。到雍正朝则有了明显变化,雍正帝是清朝第一个在全国以主动出击的方式大兴文字狱的皇帝。例如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欲打击原宠臣隆科多,便先拿趋附隆科多的进士、内阁学士查嗣庭开刀。雍正帝亲谕众臣说:查嗣庭“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居心浇薄乖张,必有平日纪载。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则有日记二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又于圣祖仁皇帝之用人行政,大肆訾谤”^①。于是,严加审讯,致其死于狱中,虽死仍以戮尸处置。这是有预定目标地估量其人必有悖逆文字,因而主动出击的事例。另一被遣发“军前效力”的陆生楠,也处于这样的监视之下。雍正帝追述曰:陆生楠“果能安静守法,自知罪过,则皆可贷其前愆,开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怼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陆生楠所著之书,悖逆之情,尽行败露”^②,表明早有算计而张网以待,随时搜查且查有所获,遂将之残酷地治以死罪。

收稿日期: 2015-05-20

作者简介: 乔治忠(1949—),男,天津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①《清世宗实录》卷48,雍正四年九月己卯。

②《清世宗实录》卷83,雍正七年七月丙午。

雍正十一年(1733),浙江总督程元章查出书生吴茂育《求志编》一书中“语多狂悖”,且序文日期只写干支,未书“雍正”年号,遂奏报清廷。雍正帝在奏疏上批示曰:“辟邪说以正风俗,惩奸匪以警人心,能见及此,殊属可嘉”,还批评有些地方官对此纠察不力,指示地方官员应当尽力搜访惩治,“切不可因远‘多事苛求’四字之嫌,而贻误于世道民生也。果能于斯一节,汲汲铲除,胜于治理刑名、钱谷案件之功,不啻什百相倍,卿其谨志,奉行勿替”。^①这是将用文字狱方式的“辟邪说”、“惩奸匪”看作极为重要的大事,置于其他一般案件之上,要求各级官府主动出击,严密查办。雍正朝的13年间,制造了多种文字狱案件,大多与其政治上打击异己、肃清隐患的行动相配合,其中并无完全属于“史狱”性质的案例,仅陆生楠《通鉴论》案件涉及历史评议的问题。

陆生楠,举人出身,曾得到雍正帝赏识,擢为工部主事。后雍正帝整治科甲出身文官的“结为朋党”问题,矛头指向李绂、谢济世等,只因陆生楠是广西人,与谢济世同乡,遂被怀疑与李绂结为党援,被发往军前效力。雍正七年(1729),他私撰的《通鉴论》十七篇被搜出,遂成罪状,处以军前斩首。雍正帝以长篇谕旨逐一反驳陆生楠《通鉴论》中的见解,而且皆上升到揭其阴谋、斥其悖逆的高度,是“上纲上线”入人之罪的最早典型。例如,针对陆生楠赞扬历史上的分封制而称之为“万事无弊之良规”,雍正帝对分封制改为郡县制的历史趋势大加论证,指出“大凡叛逆之人如吕留良、曾静、陆生楠之流,皆以宜复封建为言。盖此种悖乱之人,自知奸恶倾邪,不容于乡国,思欲效策士游说之风,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用,可去之他国”^②。又针对陆生楠论及汉武帝戾太子之事,雍正帝认为这是讥刺康熙帝。针对陆生楠论述唐代府兵制优于后世兵制,雍正帝指责其怀逆乱之心,煽惑军情,诋毁本朝最为优越的八旗军制。仅此一书,陆生楠已然“罪大恶极,情无可宥”^③,在谕旨中直接提议处以军前正法。

雍正帝史学造诣并不深厚,但其读史联系本朝政治,却可以得出惊人之论,其《御制朋党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雍正二年(1724)七月,他就特意撰成此文,颁发于宗室贵族及满汉文武大臣,指示“尔等须洗心涤虑,详玩熟体。如自信素不预朋党者,则当益加勤勉,如或不能自保,则当痛改前非”^④。《御制朋党论》主要有四项论点:

第一,要求所有臣民“惟知有君”,与君主同好

恶,“乃有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这就是说,大臣如果在爱憎情感上不成为君主的附庸,就是沾染了朋党恶习。

第二,指出朋党的危害,在于可能造成一派社会舆论以抵制君主的赏罚黜陟,有损君主专制的权威。雍正帝认为:“人臣乃敢溺私心、树朋党,各徇其好恶,以为是非……是朝廷之赏罚黜陟不足为轻重,而转以党人之咨嗟叹惜为荣,以党人之指摘诋訾为辱。乱天下之公是公非,作好恶以阴挠人主予夺之柄。朋党之为害,一至是哉!”这就点明了朋党的主要罪状,即有损于君主一人专制的政体。

第三,作为臣民,应仅存君臣之义,以公灭私。宋朝欧阳修撰写《朋党论》,提出“君子以同道为朋”,具有一定的影响。雍正帝于此痛斥欧阳修曰:“夫罔上行私,安得谓‘道’!修之所谓‘道’,亦小人之道耳!自有此论,而小人之为朋者,皆得假同道之名,以济其同利之实。朕以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那么怎样认识友情和忠君之间的关系呢?雍正帝提出:“夫朋友亦五伦之一,朋党不可有而朋友之道不可无。然惟草茅伏处之时,恒资其讲习以相协助。今即登朝莅官,则君臣为公义,而朋友为私情,人臣当以公灭私,岂得稍顾私情而违公义!”这就是说,一旦为官,最好连朋友也不要顾及,要以公灭私,仅存君臣之义。

第四,认为君主应当不避琐细、亲理庶务,这是扼制朋党的重要措施。雍正帝写道:“而无知小人,辄议朕为烦苛琐细,有云人君不当亲庶务者。……此皆朋党之锢习未去,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蔽耳目,以自便其好恶之私焉耳。”所以无论是从杜绝朋党的方法着眼,还是为了达到批斥朋党的目的,归结到一点,都需要君主总揽一切政务,加强君主的一人专制。这成为清朝君主政治的要则,此后清帝基本遵循,皆亲自处理大小政务。

第五,结朋树党决无好下场,“今之好为朋党者,不过冀其攀援扶植、缓急可恃,而不知其无益也,徒自逆天悖义,以陷于诛绝之罪,亦甚可悯矣”^⑤。因为是一篇论文,威慑之词有所节制,而在颁发《御制朋党论》的谕旨中,清世宗则明言:“嗣

①清世宗:《朱批谕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十一年十一月程元章奏折批语。

②③参见《清世宗实录》卷83,雍正七年七月丙午。

④《清世宗实录》卷22,雍正二年七月丁巳。

⑤《御制朋党论》,载《清世宗实录》卷22,雍正二年七月丁巳。

后朋党之习,务宜尽除,尔等须扪心自问,不可阳奉阴违,以致欺君罔上、悖理违天。毋谓朕恩宽大、罪不加众,倘自干国法,万不能宽。朕虽未尽行诛戮,然或千人之中百人、百人之中十人,尔等能自保不在百人、十人之列乎!……上念朝廷任用之恩。下为身家子孙之计,各勉之慎之”^①。这里杀气腾腾地表达了杜绝一切朋党的决心。乾隆帝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认为:“门户之害,甚于陷阱,一溺其中,即欲自拔亦不可得矣!”^②他藉评论明朝东林党之机,对朋党的形成原因提出了新的见解,给予了严厉训斥,“汉室党人已开标榜之渐,激而致祸。即宋之周(敦颐)、程(程颐、程颢)、张(载)、朱(熹),其阐洙泗心传,固不为无功……而蜀洛之门户、朱陆之冰炭,已启相攻之渐。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家破亡。汉、宋、明,其殷鉴也”^③。这段论述将理学的创始人一一点名指摘,甚至认为私家讲学,乃是朋党相攻的祸根,体现出强烈的君主专制主义观念。

西汉文帝召见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历来人们皆因贾谊未获重用而惋惜,雍正帝却认为汉文帝决不是弃才之主,他看出贾谊是个疏狂少年,不足任用,才聊问鬼神之事以敷衍。“设有一夫私议,妄自记载,非惟庸主无由剖析,虽明哲之君亦何从闻见而正其是非!其流传失实受诬于后世者,不知凡几矣。”^④他对史籍中贬低君主、抬高贤臣的记述皆表示怀疑,尤其厌恶“一夫私议,妄自记载”的私修史书。这是清朝皇帝一贯的思想。此前康熙帝就曾声言:“朕披览史册,于前代帝王每加留意。书生辈但知讥评往事,前代帝王虽无过失,亦必刻意指摘,论列短长,全无公是公非。”^⑤可见,清朝皇帝在历史问题上褒扬君主、压抑臣下,是一贯的理念。

至乾隆帝,就连历史上名臣、贤相的地位和作用也一并贬低,如乾隆帝读史,知北宋理学家程颐有过“天下安危系于宰相”的论点,遂予以斥责:“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但知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已不过问……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⑥乾隆四十六年(1781)搜出尹嘉铨手撰《皇朝名臣言行录》一册,不仅大兴文字狱,而且乾隆帝还连发谕旨,指斥本朝汤斌、范文程、李光地等人的行为“本无行谊过人之处”^⑦。随后又指出:“至名臣之称,必其勋业能安社稷方为无愧。然社稷待名臣而

安之,已非国家之福。况历观前代,忠良屈指可数,而奸佞则接踵不绝,可见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⑧这里所讲本朝“无名臣亦无奸臣”,集中体现了惟君主至尊,惟君主掌政的理念,已经将康熙帝、雍正帝以来的君主专制主义,推衍到空前绝后的极致地步。

二、从曾静谋反案到吕留良文字狱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湖南学人曾静派门人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动其反清。曾静、张熙等人均为无识之徒,只因闻听岳钟琪乃南宋岳飞后裔,而满族是金国后裔,就以为策反能够成功,遂决定令张熙前往岳钟琪驻地,轻率地盲动。在岳钟琪的诱骗下,张熙说出了其师曾静,以及他们崇拜的先儒吕留良。曾静撰有《知新录》,发挥了吕留良“华夷之分”的思想,煽动推翻清朝统治,特别攻击了雍正帝的十大罪恶,包括“谋父”、“逼母”、“弑兄”、“屠弟”、“怀疑杀忠”等等残暴行为。这是一件政治谋反案,清廷得到岳钟琪的报告,立即进行大搜捕,将所有稍可牵涉之人及其亲族家属,一起拘拿到案。

经过严密审讯,曾静等人试图煽动推翻清朝的谋反行为,除投书岳钟琪策动反叛之外,其余不过纸上谈兵而已,但仅此案情,依法也已足够主犯凌迟、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了。谁知雍正帝却别出心裁,搞出一番出奇策划,将曾静谋反的政治案件,引向针对吕留良等“华夷之分”思想的文字狱,宽宥曾静、张熙等人,用为宣传活口,而严惩吕留良一系“思想犯罪”者。

雍正帝认为:“曾静等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惑”,虽污蔑“朕躬”有十大罪状,实因流言恶语影响,况且“止讥及朕躬”而没有攻击皇考康熙帝。当年吴三桂等三藩之乱,从逆之人若能改悔自新,皆施宽宥,“今曾静所犯既非首恶渠魁,亦无同谋叛党,其畏罪悔过,又出实心,此朕所以宽宥其罪,并

①《清世宗实录》卷22,雍正二年七月丁巳。

②清高宗:《评鉴闡要》卷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4册),第514页。

③清高宗:《御制文二集》卷18《题〈东林列传〉》,《四库全书》(第1301册),第395页。

④《清世宗实录》卷87,雍正七年十月乙丑。

⑤《清圣祖实录》卷292,康熙六十年四月丙申。

⑥清高宗:《御制文二集》卷19《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四库全书》(第1301册),第240页。

⑦《清高宗实录》卷1127,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辛卯。

⑧《清高宗实录》卷1129,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己未。

非博宽大之名而废法也”^①。雍正帝还下令将此案资料与审问曾静等人的记录以及有关批判吕留良等“华夷”思想的谕旨等等,编辑成《大义觉迷录》一书,作为全国宣讲的教本。曾静、张熙则被清廷利用为宣传工具,归于湖南观风整俗使管辖,到处宣讲圣旨教谕、自我忏悔,极力美化清朝统治,歌颂雍正帝。

对于已故浙江学者吕留良,则严加追究,枝蔓不遗。从吕留良后裔子孙处搜出其著述,又根究吕留良之子以及学生严鸿逵、严氏学生沈在宽,均查出严重的反清著述及言论。于是将一千人犯及其家属、学生,乃至为吕、严诸人刻印书籍者,尽数逮捕。雍正帝还亲自执笔,多次发布长篇谕旨,反驳吕留良、严鸿逵等的“华夷之分”观念,痛斥这些人对清朝统治的诽谤攻击。

吕留良(1629—1683),字用晦,又字庄生,号晚村,浙江石门人,清初学者。顺治年间曾参加科举考试,但后来思想转变,视清朝为夷狄政权,采取不予合作的政治态度。在乡著书授徒,文名鹊起,被人们尊为“东海夫子”。康熙十七年(1678),曾被推荐为“博学鸿儒”科可应试才俊,但他誓死不应。后又推荐参修《明史》,亦坚不应召。可见,其抵制清朝统治的理念已经远超一般遗民学者。逝世后,门人及家属将其著述编辑刊印,有《吕晚村诗集》、《吕晚村先生文集》、《四书讲义》等书行世。吕留良对许多史籍、时文的题评在当时很有社会影响,其门生、后裔以及曾静等人,都因此而对清朝持否定或敌对立场,但可惜吕氏许多文稿今已佚失不存。吕留良的政治历史观的重心在于反对天下统一于帝王,认为应当恢复三代的等级封建制,主张“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华夏之人不能将夷狄之君视为君主。这些论点在其《四书讲义》一书中均有表述,曾静交代自己排斥夷狄的思想,就是对“吕留良论孔子称管仲之仁处,有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之说”^②的发挥。查抄出的吕留良日记、信札以及严鸿逵等的著述之中,还有许多直接蔑视清朝、攻击清帝的内容,这些都在雍正帝的批驳谕旨中有所引述。

对吕留良文字狱的定案,迟迟不予结案,目的是充分利用此案大事宣传,并且引导异端思想出笼,清算“华夷之辨”及反清思想的影响。在大臣议定刑罚之后,雍正帝指示:“朕思天下读书之人甚多,或者千万人中,尚有其人谓吕留良之罪不至于极典者。又降旨令各省学臣,遍行询问各学生、监等,将应否照大逆治罪之处,取具该生结

状具奏。其有独抒己见者,令自行具呈,学臣为之转奏,不得阻挠隐匿”。其结果自然是“咸谓吕留良父子之罪罄竹难书,律以大逆不道,实为至当,并无一人有异词者”^③。至雍正十年(1732)十二月,才最后处置人犯,将已死吕留良及其子吕葆中戮尸,另一子吕毅中斩立决。其孙辈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为奴。严鸿逵应凌迟处死,但因已死,仍戮尸示众,其祖、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岁以上者皆斩立决,男十五岁以下者及严鸿逵之母女、妻妾、姐妹俱发遣为奴。严鸿逵学生沈在宽斩立决,刻印、私藏禁书者一千人犯斩监候。其余株连者分别予以严惩,罪犯家产没收,变卖后留作浙江工程之资。^④这个处置是十分残酷的,而曾静、张熙却不受处罚,仍为官差。但雍正帝逝世后,乾隆帝立即将曾静、张熙处死,并且追缴《大义觉迷录》以销毁之,给雍正朝后期的这场事件划了句号。

曾静等人投书策反的案件,被雍正帝出人意料地改变为吕留良文字狱,充分表明在这位最高统治者的心中,把整饬人们的思想看得比平息政治谋反案更加重要、更加困难,于是费尽心机作了如此出奇的处置。然其效果,却未必可达到雍正帝的预期。乾隆帝处死曾静、张熙并且收缴《大义觉迷录》,就是对其父作法及效果的否定。

三、雍正帝的“帝王大一统”论

曾静、吕留良案件涉及到“华夷之辨”问题和中国古代政权的“正统”标准,其关键之处,在于非汉族君主建立的政权,能否成为正统政权,这是早就困扰清朝统治的社会思想问题。而宋明各代关于“夷夏之防”的理念,在清代仍有很大影响,民间此起彼伏的反清舆论与行动,大多都将清廷视为夷狄政权,不承认其正统地位。而“正统”又与“大一统”观念直接联系,构成中国朝廷政治历史观的核心价值准则。

在传统的政治历史观中,“正统”思想又与“大一统”观念有着直接联系,二者结合而构成中国皇朝政治历史观的核心价值准则。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起源甚早,《公羊传》对孔子《春秋》中的“春王正月”作了“大一统”的解释,于是“大一统”观念被认为是孔子《春秋》大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清代文字狱档》(下)第9辑,影印原故宫文献馆印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941页。

②《大义觉迷录》卷1,清代原书影印本,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73页。

③④《清世宗实录》卷126,雍正十年十二月乙丑。

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① 这种“大一统”思想的特征是:其一,以君主为统治核心,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行“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如《礼记·坊记》所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由此而必然导致君主的绝对至尊地位。其二,严执华夷之别,主张“贵中华、贱夷狄”,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号,抵御少数民族向内地的侵扰,否定夷狄有统治中国的合法地位。在华、夷观念上,有时也比较宽松,如唐太宗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②。但明代取代蒙古族为统治者的元朝,中后期又面临外族的严重侵扰,因此“华夷之辨”的观念日益严刻,朝野人士几乎众口一词地否定夷狄政权入主内地的合法性,强调华夏方为正统的主张。这种思想积淀长久,影响很深。明清之际,天崩地坼,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许多汉族官僚、士人不承认清廷的统治,操起华夷之辨的思想武器,承袭《春秋》“尊王攘夷”大义,传播并激起反清情绪。这成为清廷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敌对舆论。在曾静、吕留良案件中,雍正帝认为对此不能仅以刑法处置来解决,必须面对“华夷之辨”思想,从理论上破除“《春秋》大一统”的“尊王攘夷”观念,提出清廷官方的大一统理论。于是,他亲撰多道长篇谕旨,反驳吕留良等人的论点,系统阐发自己的见解。雍正帝的“大一统”理论要点,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其一,有德者的政权可以得天下大统。雍正帝引证《古文尚书·蔡仲之命》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指出:“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这是“自古迄今,万世之不易之常经”。上天只能据德而选君主,绝无依据何地之人予以取舍的道理,民心向背,也是论德而不择地。按照这个原则,不论何地之人、何种民族,都有君临天下的合法资格,而从历史上看,“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清朝统治中国,也是应天受命,不容毁谤,“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③。因此,以“华夷之分”观念对抗清廷的统治,乃是逆天行为,罪大恶极。

其二,清朝得天下最正。雍正帝承袭清初以来的说法,认为清入关之前,“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哉!”这比

起明祖作为元朝臣民而夺取天下更为名正言顺。清朝的统治造成了中国“环宇义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将此与明朝自嘉靖之后生民涂炭、疆场靡宁的状况对比,优劣昭然,怀有反清复明意志的人是毫无人心的,所以,“揆之天道,验之人望,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④。

其三,历史地考察华夷问题。雍正帝并不完全否认华夷之别,而是将所谓的夷狄问题作了一番历史性的考察。他指出:“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有苗、荆楚、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之为夷狄可乎?”意思是说,在历史的进程中,所谓的夷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将华夷之分视为人禽之分而肆行谩骂,乃是违天背理的。雍正帝指出:“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尔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皞宁静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因此,在清朝天下一统的时期,再不可妄分华夷、中外,所谓华夷之别只是地域的不同。故曰:“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⑤ 后来,雍正帝对这种观点又有更详尽的阐述:“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滋山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圣帝,而孟子以为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为周之臣子,亦以文王为夷,然则‘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别也”^⑥。这里,雍正帝以地域的概念取代民族的区别,带有掩盖民族压迫的欺骗性,但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到民族融合,认为区别日益缩小,从而强调中外一家,言论中否定民族间的相互歧视,将之作为“大一统”的基础,则在思想理论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①《汉书》卷56《董仲舒传》。

②《资治通鉴》卷197,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二月甲寅。

③⑤参见《大义觉迷录》卷1,雍正上谕二份。

④参见《清世宗实录》卷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⑥《清世宗实录》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其四,君臣居五伦之首。针对曾静等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论点,雍正帝从“人”的本义上予以剖析,诡巧地应用了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学说。他提出:“夫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同于禽兽者,以有伦理之常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①这样,君臣大义乃是作人的最高准则,人臣只有忠于君主,才不愧为人类。在“《春秋》大一统”的旧有观念中,本来是强调君主为统治核心和至尊无上地位的,但在华夷之辨另一理论支柱的制约下,作为统治核心的君主只能是华夏族的君主。雍正帝对《春秋》之义重作解释,否认《春秋》有“尊王攘夷”的义旨,认为《春秋》大义在于扶植纲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样就抽去了“《春秋》大一统”内“华夷之辨”的内容,将其改造为“四海之内共尊一君”的君主专制大一统观念。无论什么民族,都可因有德而受命为君,所有天下臣民,都必须对君主绝对忠诚,否则即不耻于人类。这是雍正帝新的“大一统”论的根本特点。

其五,批斥主张分封制的政见。在中国古代,是实行类若西周的分封制,还是仿照秦朝的中央集权政体,在理论上有过反复争论,在各王朝的政治中也历经反复试行和废止。然而,无论在政治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体制上,限制及取消分封制都是古代历史发展的主导方向。但时至清朝,主张实行分封的政治见解仍不时地涌出,这实际上是对君主极端独裁专制的一种曲折的思想抵制。吕留良、曾静皆有实行分封制的主张,同时也反对君主的极端专制。正当曾静之案审理的过程中,又发现陆生楠所撰《通鉴论》,其中鼓吹分封制为“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雍正帝对此亲自撰文大加挞伐,认为:“古之有封建,原非以其制为尽善,而特创此以驾馭天下也。洪荒之世,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圣人首出,则天下之众莫不尊亲,而圣人即各因其世守而封之,亦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盖时势如此,虽欲统一之而不能也。”这里对分封制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将分封制看成上古“声教未通”,即历史发展较低阶段不得已实行的制度,亦为灼见。据此,他认为中央集权的一统制度是必然趋势,并引孔子语“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语“天下恶乎定?定于一”,指出“孔子、孟子深见春秋、战国

诸侯战争之流弊,其言已启一统之先幾矣”。接着,雍正帝分析了历史上一统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提出“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在这种国家已成“大一统”的形势下,竟敢鼓吹分封、攻击一统天下为“害深祸烈”,自属大逆不道。总之,主张分封制不仅是反对君主专制“大一统”政治的敌对思想,而且是叛逆者的一种阴谋诡计。

雍正帝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清朝国力日益强盛的形势下,同汉族士人中反清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依据的思想体系仍然是传统的儒学体系内的纲常伦理,并包含着以舆论维护清朝统治地位的动机。但这并不妨碍其在思想上优于以强调“攘夷”为特征的旧观念。清廷将自己的大一统政权视为“天下一统、华夷一家”,雍正帝屡次表白自己对臣下“推心置腹,满汉从无异视”^②,这固然未必在实际上完全贯彻,但总比公然鼓动民族压迫、民族仇视的思想更具备理智精神。我们今天所要批判的只是雍正帝这种“帝王大一统”思想蕴含的极端君主专制主义,而不应因为反对清廷的极端专制就转而同情极端的“华夷之辨”观念。

雍正朝施行主动出击的文字狱,主要目的不是惩处民间具体的反清情结,而是想从思想理论上整饬由来甚久的“华夷之辨”思想,树立以帝王大一统为标准的正统理论,将政治历史观念统一起来,瓦解民间的反清舆论。清廷将文字狱提高到历史理论的层次,并且将禁忌从明清之际历史延伸于古代,例如陆生楠谈论分封制、兵制,议论汉武帝戾太子等等都成罪状,是雍正朝区别于前朝的一大特点,反映了思想文化斗争的深化。雍正帝自己在历史理论的研讨上作出了努力,也很有创见,但摆在世人眼前的仍然是深重的民族压迫和处置文字狱的血腥屠杀,这不能真正解决思想问题。清朝要想调和官方历史观念与私家学者的矛盾,还要走很长的路。但雍正朝重视历史理论的整饬,毕竟为乾隆朝建立官方系统历史评论体系开了先河,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尝试。

四、雍正帝整饬政治历史观的性质与收效

上述雍正帝整饬思想的几项典型事例,实际都是以官方高压态势发动的文字狱活动,无论其中发布了多少长篇谕旨,精心构思了多少论点、论

^①参见《清世宗实录》卷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②《清世宗实录》卷48,雍正四年九月乙卯。

据,都是依托于官方强力实施思想文化钳制的举措,其性质都是绝对化的君主一人专制。在雍正帝的谕旨中,不能说没有任何可圈可点的新理论、新见解,如关于“帝王大一统”的论说,即在字面上具有可能消弭民族敌对的进步思想。但即使是这种颇具新意的观念,也紧紧依附于最高统治者唯我独尊的利益核心,强调的是清帝有“德”故能君临天下,君臣之伦为五伦之首,主张绝对的中央集权,鼓吹清朝“得天下最正”等等,不仅与汉民众的利益悬隔,甚至与官僚阶层也有所疏离,因此仅有威慑力而缺少影响力。

雍正帝自称对臣下“推心置腹,满汉从无异视”,是一个从来不准准备兑现的谎言。清朝在制度上早已确立了满族具有特殊的政治和经济优待,官僚体制上,各个衙门的满官皆高于汉员。清廷统治者的民族戒备心理可以说是时时提醒、念念不忘、坚守不懈。他们自觉地、政策性地将民族界限标识于外,贯彻于心,并未向消解民族隔阂的方向做出多少实际的努力。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根本不会合理地解决民族问题,只有在统治、控驭和役使的角度上,才会表现出某种“满汉从无异视”,而这恰恰是君主集权的特征。

传统的政治历史观是系统的思想体系,而且与传统史学理念密切联系,其中不仅包括“华夷之分”、“大一统”、“正统论”等概括性理论,而且需要细化到对历代政权的具体判断和判断标准,这种判断还要以某种方式体现于历史著述的义例之中。而雍正帝只是在几个敏感或较为显著的历史观念上做出整饬,虽抓了重点但很不全面,因此显

示的乃是强力推行机制,缺少学理性的基础。对传统政治历史观进行系统性的清理和改造,在清雍正朝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清廷在史学建设上尚未完成本朝史学基本格局的建设。康熙后期废止的《明史》、《一统志》、国史等纂修事项,雍正朝虽然恢复,但皆未完成或成果不显,而且这些修史工作与史学理论、历史理论的系统清理尚有不小的距离。雍正帝个人的史学造诣,也不足以担当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史学建设的领导角色。他能够做出权威性的论断,震慑一时,但长久的影响力则难以维持。这样,清廷全面整饬史学思想和政治历史观的任务,就留给了乾隆朝。乾隆二十四年(1759),《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在乾隆帝直接主导下纂修,是清朝全面整顿历史观念的开始,至纂修《四库全书》时期而达到高潮并趋向成熟。这中间,乃同时采取了文字狱和大力修史、全面评论历史的方式,极端君主专制主义依旧为主要特征,但学术性结合于文化专制之内,已经超越历朝历代。此为后事,这里从略。

雍正帝对历史政治观的整饬虽有诸多缺陷,但还是有所收效的,文字狱造成的严酷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气候,使不少文人、学者下笔临文心存畏惧,被动地恪守清廷宣示的思想准绳,这是统治者期望的后果之一。乾隆帝也汲取了康熙、雍正朝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挥了雍正帝关于帝王大一统和反对朋党等历史观念,并且进一步承袭了主动出击的文字狱罗织方式。因此,可以将雍正帝的举措,视为乾隆朝全面整顿历史学和历史观的前奏,为乾隆朝提供了启迪与示范。

On Rectifying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Viewpoints During the Qing Yongzheng Dynasty

QIAO Zhi-zhong

(College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many different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viewpoints such as "Hua-Yi Distinction", "unification", "orthodox", etc., which became the ideological problems perplexing the early Qing rulers. Then Emperor Yongzheng took the initiative to rectify these problems by literary inquisition and issued long imperial edicts adjudicating "Hua-Yi", "cliques", and "imperial unification", which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autocracy. Although not theoretical and systemic, some of them, including "imperial unification", were positive. The effect of Yongzheng's rectifying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viewpoints mainly lied in the high pressure that forced most scholars to submit, taking the initiative in literary inquisition, fighting the cliques, "imperial unification" and so on. These decisions provided a model for Qianlong to rectify the historical viewpoints and historiographic ideas comprehensively.

Key words: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viewpoint; rectify; Emperor Yongzheng; literary inquisition; imperial unification